

# 没有科技馆,暑假就没意义?

【今日视点】

自从2000年兰州科技馆拆除以后,新的甘肃省科技馆至今没有建起来,有80万名孩子的兰州市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科技馆的内陆省会城市。没有一个科技馆,难找到活动场所,不愿意去图书馆,80万兰州孩子无处打发漫长暑假。

(《中国青年报》7月9日)  
因没有科技馆就认定孩子们无法过一个“有意义的假期”,恐怕有些偏颇。20年前,我读小学,那时候物质生活贫乏,什么科技馆、博物馆,我们

闻所未闻,但我们的寒暑假一样过得充实,很有意义。我们那时候有红领巾小组,度长假都是集体活动,比如走进大自然采集植物和昆虫的标本,比如办少先队假期报刊,或者去医院去军营参观,甚至去体验卖冰棍、卖菜的艰辛。

不单如此,社会也很关注孩子们的假期活动,父母的单位往往会组织很多活动来丰富我们的假期生活,比如组织夏令营、乒乓球比赛、谜语比赛等等,这些活动不仅增长了我们的见识,也陶冶了我们的情操,现在想来,依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20年过去了,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,为何孩子们有意义的假期却越来越少呢?我想,这一方面是没有积极发挥孩子自身的作用,另外一方面是学校和家庭以及社会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。此外,也和我们竞争的社会所浮现的一种偏见不无关系,比如有的家长就认为孩子参加假期补习班特长班有意义,而去学雷锋做好事就是傻子。认为孩子学钢琴、古筝是陶冶情操,而去和大自然做亲密接触就是放任自流。甚至某些家长完全以自己的想法来代替孩子心目中自己的事情。将寻找“有意义的事情”的视线定格于那些物质堆砌起来的场所,这样的做法,自然会导致一种“无处打发漫长暑假”的假象。

科技馆和博物馆的缺乏,确有改进的必要,但家长和学校也应检查一下自己的“有意义的假期”的观念是否过于狭隘。在没有科技馆和博物馆之前,家长完全可以通过引导孩子过一个完美的假期,做到这点,其实并不难,在20年前物质贫乏的年代都能做到,今天有何理由不能做到呢?

(徐德国 湖北 医生)



## 爱丑女,不爱美人?

近日有一南京富家美女,托某调查公司调查其夫不轨之举。美女凄然曰:“本小姐虽无国色天香之容,亦有闭月羞花之貌。家父又是老板,家道十分富足。那冤家本一介布衣,姑奶奶我上看他,实属他三生有幸也,而今,他居然不抬举,胆敢提出解除婚约,真是狗胆包天!定是他绿杏出墙,有了外遇。”

后经细查,美女丈夫果与一女子有染。只是那女子相貌平平,无钱无才无貌,美女更加困惑:“此女莫非施了魔法,凭什么俘获我家相公?”列位有所不知,此富家

美女仗着财大,所以气粗,对其夫一向骄横跋扈,每每凤颜大怒,必要其夫百般献媚,哄得她芳心大悦,方才作罢。时间一长,其夫疲态尽显,不满之心渐浓,故有“不识抬举”之举!

噫!世间有多少女子,与此富家女何其相像也!女子撒娇发嗲无可厚非,但夫妻本应互相尊重,偏有人颐指气使,尤喜“奴役、征服”男友或老公,让其言听计从,逼迫对方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,堂堂七尺男儿,焉有不累施了魔法,凭什么俘获我家相公?”列位有所不知,此富家

## 生了他,不能养他?

近来,一些媒体连推关于贫困生的报道,很感人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一些贫困生家庭子女特别多,诸如南京玄武区的一名残疾人家里,也一连生了三个孩子。如今,孩子学习很争气,可家里已经无力供他们继续读书了。

都说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这些贫困生,身处逆境却却能发奋图强,让人怜惜不已。他们的家庭之所以贫困,原因林林总总。但,子女多,是不是也是致贫的原因之一呢?在我的农村老家,经常可以看到墙上写着“少生孩子快致富”的标语。虽然少生孩子并不一定快致富,可对许多家庭来说,子女太多

致贫困也是事实。我看到不少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,尽管也很穷,但父母咬咬牙,孩子读书好歹也能维持下去。可子女较多的家庭,手心手背都是肉,不少父母要么把他们全部从学校里拉出来,要么为了供其中一个孩子读书,而牺牲另外几个孩子的学业。对此,我常觉心酸,有时就替他们想,当初为什么不就少生几个孩子呢?经过媒体报道的贫困生,可能会有好心人资助。但我知道,还有更多的贫困生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读书、上大学。他们会不会感到困惑:父母生了我们,为什么无法养育我们呢?

## “治沙成绩”不是自封的

【公民发言】

新华社7月9日报道,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人士日前表示,今年北京沙尘天气较往年次数偏多,强度大,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,但不能因此否定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所取得的成绩。

的确不能因沙尘次数偏多而否定治理成效。但这个成绩和成效不是自封的,应由感受最真切的普通百姓来评判。

在问题依然严重的时候想的却是“成绩”,显得很不合时宜,很容易让人觉得其功利心太强,好像做事就是为了“成绩”。而老百姓想要的不是“成绩”,而是要真正解决问题。

不要说沙尘问题还没有完全根除,即便取得显著效果,也不当索取“表扬”;即便是成绩

突出,也当从成绩中挖出问题进一步去解决。

不过话说回来,既然说有“成绩”“成效”,就当拿出具体数据来说明。但其所提供的数据竟然基本上都是说的“投入”,即从2000年开始,总共完成投资185亿元,已占国家全部计划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;治理工程区涉及75个县(旗、市、区),平均每个县安排资金约2.47亿元。有如此大的投入,那效果如何呢?这不用说大家都看到或者感受到了,即如报道中所说的“北京沙尘天气较往年次数偏多,强度大”。这样看来,成绩和成效是有的,但毕竟离群众的要求还有距离,既然如此,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大谈什么“成绩”吧。

(孙正龙 江苏 职员)

## 谁来同情这一车西瓜?

【他山之石】

有向瓜农收巨额卫生费的现代都市、有要擦皮鞋者统一着装的都怪谈,有要建设“无摊城市”的城市乌托邦……在过眼的新闻里总有一些人,因为城市的面子而呼吸艰难。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医院,40岁的李玉梅哭着称,几天前,她丈夫在街上卖玉米时,被市政管理人员打成骨折。(7月8日《大河报》)

在城市,谁会同情一筐鲜香玉米、一车甜西瓜的命运?这一切,只因怕被玉米、西瓜“弄脏了地面”。为何玉米、西瓜在城市的命运如此不堪?是“市容市貌决定论”。在“街道整治”的城市政绩表象观作祟下,一些好面子的城市政府,默认“能干队伍”运用暴力“清洁地面”。他们可以无视现实的民生与人文取向于脑后,沿着权力路径走向思维的偏执,把

社会胜境理想化地归置成“城市人自家的天堂”。于是,以玉米、西瓜为代表的民生利益,成了城市妆容上的雀斑,城市管理者以为必“除之而后美”。

我在韩国旅游时,一直为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小摊小贩担心,这些普遍“占道经营”的行为,能与干净的城市相安无事吗?然而,这里的城市很干净,我也没看见一个城管。据说,当纽约市议会提出《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》,要对占道经营加以“有条件”限制时,纽约市长否决了提案,理由是这将可能使一部分“新移民”、“小生意者”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损害……相比之下,我们的城市为何容不下玉米和西瓜?

(邓海建 原载7月9日《新京报》,本报有删节)

本版言论除评论员文章外均不代表本报观点  
wfwcbxyh@vip.sohu.net

## 南京话本

### 谁来帮他们控制创业风险

“陈峰伟”这个名字,曾经让很多南京的大学生激动不已。这个南邮的大二男生,去年年底因“休学创业,开放电器大卖场对抗商业巨头”而名噪一时,成为不少大学生们心向往之的“创业英雄”,但现在,他的唐吉珂德般的梦想、他的豪言壮语,都已经灰飞烟灭。如今的他,是一个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,上个月刚刚开张的“唐电电器”也已经停业。当光芒褪尽,当豪言不再,陈峰伟展示给我们的,不仅是涉嫌诈骗的巨大惊讶,更有大学生创业的艰辛和苦涩。

陈峰伟“落马”的新闻中说,导致他成为诈骗嫌疑人的是两万元借款,受害人向记者表示,他掌握了大量陈峰伟向同学们频繁借钱的数据,这足以证明陈本人的融资存在问题。在创业之初,陈峰伟曾多次表示他已经获得300万以上的投资,如果“向同学大量借钱”的说法属实,那么,这“300万以上的投资”要伤害多少个同样心存创业梦想的同学?将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。

陈峰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,他的悲哀,在于低估了创业的风险,低估了热情航程背后的暗礁。在某种程度上,陈峰伟是很多心怀创业梦想的大学生的缩影,陈峰伟的悲剧应该让我们反思:怎样才能避免更多的学生像他这样在创业中碰得头破血流?换句话说,谁来帮助这些激情四溢的学生们评估、控制创业风险?谁来给他们提供创业之初的更多支持?

大学生创业屡见不鲜,但失败的案例也不绝于耳。这其中的原因,除了那些学生们冲劲有余、稳健不足外,风险控制服务的缺乏、大学生创业帮扶政策的不完善,可以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在这方面,大学的管理者,乃至制定大学生创业帮扶政策的有关部门,都应该直视不足并加以改进,以最大的责任心帮助学生评估控制创业风险,为他们的创业提供更完善的帮扶政策。

陈峰伟的悲剧令人唏嘘,但愿,他能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多角度的思考,而不仅仅是“落马”这么简单。



今日主持 赵勇



## 招聘“夫人”好荒唐

【漫话天下】  
□冯磊 / 文 艺静 / 图

成都一个按摩店的老板突发奇想,要招聘一名“夫人”。待遇是“试用期每个月1000元,意外保险一份,签正式合同者,可配汽车一辆,丫环一名”。(《成都晚报》7月9日)  
“夫人”还有试用期?

把女性当作花瓶的心态,彻底暴露出一种暴发户沾沾自喜和颐指气使的尊严!而更可悲的是,这种所谓的“招聘”,还有人相信,并且愿意前去“应聘”,如果没有这些看客,类似“招聘夫人”的丑闻还会一再上演吗?这种迥异于社会发展主流的现象本身值得人们深思。在尊

重女性和女权都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,一则小小的招聘“夫人”广告,折射出某些人丑陋的灵魂。不客气地说:设这个局参与炒作的人和当事者是可耻的,而津津乐道于“夫人”和“丫环”的暴发户心态同样是可耻的,这种把垃圾当珍宝供奉的心态更是可耻的。

## 炒作“杨翁恋”该歇歇了

【公民发言】

纵览一年多来关于杨振宁的报道,其“主要内容”连篇累牍地都集中在“杨翁恋”上——杨振宁与翁帆携手某地、杨振宁与翁帆幸福相伴……如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最近,在参加完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颁奖后飞赴新加坡的杨振宁夫妇,接受记者专访时,再次谈及两人的婚后的幸福生活。(《新华网》7月9日)

作为一个名人,杨振宁的私生活肯定会是媒体报道的内容,但“杨翁”结婚已经很长时间,在今天仍不厌其烦地把此作为报道杨振宁的“重点”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畅谈“杨振宁的幸福生活”,是不是有些过头了?

正如有网友说的那样,给杨振宁和翁帆留一点隐私的空间吧,幸福也好、痛苦也罢,那是人家自己的选择。无休止地拿“杨翁恋”作为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

看点,其实是小看了公众的阅读理性。更重要的是,如此一来,应该及时报道的内容都由于过度追捧“杨翁恋”而为媒体所忽视,有悖于大众信息传播的主旨和功能。就事论事,参加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颁奖的杨振宁,在会上发表了什么观点或者有什么具体活动,我们统统不得而知,扑面而来的几乎全是“杨振宁的幸福生活”。这正常吗?(陈一舟 山东 职员)

## 光荣和耻辱就在一刹那

【热点纵论】

《北京娱乐信报》7月9日报道:7月7日,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安分局举行揭牌仪式,该局要求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缴纳“赞助费”。记者调查发现,举行揭牌仪式当天确有工作人员在收钱,而该局局长张公民也承认收“赞助费”一事,但称缴款都是自愿的。

我不想再重复权力必须要得到制度监督之类的老调,制度已经不少,只是被认真执行得不多,倒是揭发这件事情的媒体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值得致敬。在查阅了该新闻的首发报刊《华商报》7月8日的报道之后,我发现《北京娱乐信报》的转载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——“记者

采访离开时,该局一工作人员拉住记者,一边往记者手中塞一个信封,一边说‘辛苦了,看能不能不发稿子’,此行为被记者当即拒绝。”

正是由于记者拒绝了药监局工作人员的“贿赂”,于是公众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,在这里必须为这个记者,同时也要为《华商报》的编辑鼓掌,为他们的职业良知,为他们的责任担当,因为这是他们的光荣。这个细节同时也提醒我们,之所以我们过去看不到这样的新闻,并不是没有发生过,而恰恰可能就在那些细节的地方,监督者伸手接下了被监督者的信封,于是发生的一切丑恶都会被悄悄地掩盖起来,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监督与被监督常常表现

在一些细节的地方,光荣和耻辱恰恰是在一刹那。在这则新闻里出现了两组监管与被监管的对象,药监局和医药单位医院是一组,另一组是媒体记者和被曝光单位,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,作为法定监督履职者的药监局在摆桌收受被监管者的“自愿捐款”,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监督别人;而作为软性监督的媒体监督因为有了有良知者的“拒绝贿赂”,使前者的丑行得以披露,这是媒体的光荣。

行文至此,浏览到一则该药监局局长退款的新闻,边上还配有局长数钱的大幅照片,这样的亮相,除了让人看到媒体的风骨,还有的大概就是数钱者的愚蠢和无耻了。(陈春 江苏 职员)